

Victor Kraft 111-4

THE VIENNA CIRCLE

The Origin of Neo - Positivism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ecent philosophy

Copyright, 1953, by 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INC.

15 East 40th Street, New York 16, N. Y.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Der Wiener Kreis*

By

Arthur Pap

目 录

导言	1
作者为英译本写的序	4
第一部分 维也纳学派的历史	7
第二部分 维也纳学派的工作	19
第一章 逻辑和语言	22
第一节 逻辑和数学	22
第二节 语言的逻辑分析	30
一、语义分析	34
(1) 意义,无意义和形而上学	34
(2) 内容和结构	44
二、句法分析	49
(1) 句法和逻辑	49
(2) 准句法语句	62
第二章 经验主义	80
第一节 经验概念的构造系统	80
第二节 经验陈述的证实基础	104
一、证实陈述	104
二、对全称陈述的证实	118
三、真与验证	127
四、概率	132
(1) 逻辑概率(命题概率)	132
(2) 概率演算	134

导 言

维也纳学派(与柏林经验哲学学会一起)构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哲学运动的出发点。这一国际性的哲学运动导致了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再生与革新。新实证主义在当代哲学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中尤其是如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新实证主义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出现的最重要的严肃的哲学运动。但是恰恰就是在德意志文化区域内,维也纳学派的工作却遭到了无条件的拒绝——如果说还不是干脆就没有被注意到的话。事实上,在德国熟悉维也纳学派工作的人一直是、而且至今仍然是十分稀少的。人们知道的仅仅是该学派初期的工作。下列事实就表明了这一点:格哈特·勒曼(Gerhart Lehman)于他近在1943年出版的《当代德国哲学》一书中仅仅只提到卡尔纳普。的确,该书也列举了卡尔纳普的早期著作,如他的博士论文,他在1927年写的论文“本义概念与非本义概念”,1928年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和《伪问题》,1929年的《逻辑斯蒂大纲》,但却没有提到卡尔纳普较晚时期的任何一篇著作——尽管这些著作是如此重要。而且,即使是所提到的那些著作也是完全被误解了,其中的主要论点根本没有被领会到。同样,德尔·内格罗(Del Negro)的《当代德国哲学史》比上书仅仅早出一年,却把《世界的逻辑构造》当作该学派的最重要的著作。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之后接着问世的那些记录了维也纳学派之进展的大量出版物,例如八卷《认识》杂志中的论文,卡尔纳普的《语言的逻辑句法》,石里克的《论文集》等等,竟一篇也没有被注意到。之后,该学

派的这些出版物以及事实上是整个的运动就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气氛之下遭到贬低、压制而默默无闻了。博申斯基(Bochenski)最近的著述《当代欧洲哲学》(1947)整个来说是一部好书,其中对新实证主义与维也纳学派的论述比上述两书要好得多,但即使在这样一部书中也还是有一些不当之处,而且讨论也太简短了。

对维也纳学派的工作的更为详尽的分析主要只能在德国之外出版的著作中找到。这方面我们首先有温伯格(J. R. Weinberg)所写的内行的长篇专著《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考察》(伦敦 1936),但该书主要论述以维特根斯坦为突出代表的早期情况。透彻的分析还见冯赖特(G. H. von Wright)对新实证主义的精彩讨论:《逻辑经验主义》(赫尔辛基 1943),只是该书用瑞典文写成,一般读者不易阅读。其余在国外出版的评介著作中有一些还在维也纳学派早期即已问世,例如凯拉(Kaila)的精彩的批判性论文《逻辑的新实证主义》早在 1930 年即已发表,又如佩策尔(Petzell)的在当时很不错而现在则当然已过时了的专题文章《逻辑实证主义》(1931)以及
vii 同一作者对原录语句(protocol·sentences)的批判:《认识研究的方法问题》(1935)。另外一些则是十分简短的文摘,例如沃勒曼(Vouillemin)的《科学的逻辑与维也纳学派》(1935)以及莫里斯(C. W. Morris)的《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及科学经验主义》(1937)。[布卢姆贝格(Blumberg)与费格尔(Feigl)所写的有关文章我虽多方设法搜寻,遗憾的是一直未能找到。]在国外对维也纳学派学说的评述中还应提到艾耶尔(A. J. Ayer)的《语言、真理与逻辑》(1938, 第二版 1946)。

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对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成就、问题和结论作一纲要式的讨论将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不仅是为了使它们不至于被人遗忘,更主要的是为了要把这一运动的基本思想放到当代德国哲学家的眼前——后者对这些思想是不够熟悉的。

维也纳学派的日子已经过去——至少在维也纳是如此。维也纳学派的工作——其中也有我一份——已经结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评述只延伸到1938年学派解体时为止的理由。事实上，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我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隔绝状态，要想充分地掌握国外该学派前成员的出版物以及其它关于维也纳学派的出版物的情况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除了卡尔纳普的近期著作以外，我们不可能多考虑这类近期的文献。

在评价维也纳学派的工作的时候，人们不应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的工作并没有做完，它是被突然拆散的。有许多走极端的过分简单化或激进主义可以作为一种未完成的进展的早期阶段而得到解释。该学派所持有的观点一再地发生变化，卡尔纳普之放弃他那片面的句法观点即为一例。这一事实表明，如果维也纳学派的工作能够继续下去，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会取得更为成熟的解答。事实上如果有谁想要强调那些走极端的构述及推断，那么对于维也纳学派的成就就可以很容易地给出一种与本书不同的看法。但那样做的话对维也纳学派将是不公正的。他们工作的重大积极的意义是无可置疑的。这并不是说我想要毫无保留地维护该学派的观点，事实上我在评介中还不时地对某些基本之点插入了批判性的评论。但维也纳学派力图全面而深入地澄清知识的基础，他们的工作态度以及他们在实际上完成这一任务时所达到的清晰和严密在近期德国哲学中是没有先例的。即使对那些不同意维也纳学派观点的人来说，该学派也还是有许多东西值得他们学习的。

维·克拉夫特

1950年3月维也纳

作者为英译本写的序

由维也纳学派所发起的运动在德语国家中没有引起反响,但在其他国家里却被接受,并被发扬光大。在英国,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特别是在美国,这一运动取得了活跃的进展。因此,我对这一运动起源的叙述出版了英译本,这是合理而又值得高兴的事情。我的书概括地评述了构成新的出发点的那些问题及所尝试的解答,以此为立足点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把握进一步的发展和各种不同发挥的基础及其统一的纽带。我要感谢哲学图书公司,特别还要感谢派帕(Pap)教授的极为精心而忠实的翻译,这使本书并由此使维也纳学派的工作得以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的广大范围内易于为公众所获知。选择对应的术语并在译文中保留被译语句的确切意义是一项困难的工作,这要求译者对书中的材料十分熟悉,而这些材料中有些部分是很难捉摸的——因而也正是需要像派帕教授这样的一位专家来完成这一工作。由于他的努力,有几个段落在英译本中构写得更为精确了;也只是由于他的缘故,“语句”与“命题”这两个术语的区别被一贯地保持了下来;他还用脚注的形式作了一些极有价值的补充。

本书仅仅论述了维也纳学派原来的工作。这一学派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解体。对于由维也纳学派所发起的这一场运动,如果有人写出它直至今日的进一步发展的历史,那真可说是最理想的事情了。要做好这一件工作在美国将比在欧洲远为容易,因为这一运动的中心现在是在美国,而在遥远的异国要浏览那些

维也纳学派的历史^{〔1〕}

自 1895 年以来维也纳大学一直有一个归纳科学的哲学教授席位。最初它是为马赫设立的,马赫占有这一席位至 1901 年。之后,从 1902 年至 1906 年,它由波尔兹曼取得。此后,这一席位归于阿道夫·施特尔(Adolf Stoehr)这位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这样,在维也纳就一直存在着一种经验主义哲学的长期传统,这种哲学主要关心的是自然科学。而且甚至是在此之前,经验主义的倾向即已通过弗朗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而在某种意义上坚持着自己的地位。特奥多尔·贡佩兹(Theodor Gomperz)和约德尔(Jodl)代表了反形而上学的哲学。1922 年,归纳科学的哲学教授席位授予了莫里茨·石里克。石里克与他的前任一样是从物理学进入哲学的。他在普朗克指导下所写的博士论文的论题是非均匀介质中的光反射。他在 1917 年的专题论文《当代物理学中的空间与时间》使他成为相对论的第一位哲学阐释者。他与精确科学的领袖人物如普朗克、爱因斯坦、希尔伯特等保持着个人的交往。但是他的前任马赫及波尔兹曼不同之处在于他还精通哲学知识。

很快在维也纳围绕石里克形成了一个学圈,其成员不仅有学生,也有一些对哲学感兴趣的学者。内中有石里克的一些高材生,其中魏斯曼(Fr. Waismann)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也有那些已有造

〔1〕 参见《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Wissenschaftliche Weltauffassung. Der Wiener Kreis. Vienna 1929*)又见纽拉特,《逻辑经验主义与维也纳学派》(*"Den logiska Empirismen och Wiener Kretsen"*)1936;载《理论》(*Theoria*)第Ⅱ卷,第 72 页以下。

诣的哲学博士如纽拉特(Neurath)、E. 齐泽尔(E. Zilsel)、H. 费格⁴尔、B. V. 尤霍斯(B. V. Juhos)、H. 奈德尔(H. Neider);此外还有石里克的或远或近的同事如讲师卡尔纳普、克拉夫特、考夫曼(F. Kaufmann)等人,学派中不仅有“纯粹的”哲学家,同样也有对哲学感兴趣的数学家如汉恩(H. Hahn)教授,门格尔(Menger)、拉达科维克(Rodakovic)、哥德尔(Goedel)等讲师。学派的这一组成使他们所进行的讨论具有不同平常的高水平。数学方面的这些代表人物——还有卡尔纳普、魏斯曼、齐泽尔、纽拉特,考夫曼在数学上也是强有力的——加强了在逻辑上要求严密和精确的倾向。在或长或短的集会上讨论了逻辑的和认识论的问题。由于他们的领导人物^[2]——主要是石里克,卡尔纳普、纽拉特、魏斯曼、汉恩、齐泽尔——的背景及独创性的分析,他们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当时实际进行着的是一种相互合作的建设性的分析而不是对某位导师的学说的简单接受。石里克决不是唯一的领导人物。大量有影响的建议来自维特根斯坦,虽然后者从未亲自参加集会。维特根斯坦当时在维也纳,他的建议是通过与他有个人接触的石里克及魏斯曼来传达的。这样,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就远远超过了他的《逻辑哲学论》一书的作用。^[3]维也纳学派的共同协作带来了通常只有在专门科学中才会发生的那种飞速进展。很自然,这样一种高速的发展包含着观点的一再改变。可以预料,某些原来的过分

[2] 参与者的生平可见《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Wissenschaftliche Weltanfassnung* 1929);又见《认识》(*Erkenntnis*) V. I, p. 315 f., 以及《统一科学》(*Einheitswissenschaft*) 第一分册,第 30 页;第三分册,第 21, 22 页。

[3] 这一点例如可由石里克自己的明确阐述作证,见其论文《意义和证实》,载《论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第 340 页。石里克在文中表明他对意义的定义来自与维特根斯坦所进行的讨论,这些讨论极大地影响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从这位哲学家那里受益之深是无论怎么说也不会过份的。”[参见《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39 页。——译者注]

简单化的学说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被取代。

- 5 1929年石里克受波恩大学聘请,但经过一阵犹豫之后,他还是拒绝了。同年春天和夏天,他作为客座教授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正是在这一时期里,人们先是面临着失去石里克的可能,又再经受了拖长时间的缺席,于是该学派的成员们开始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已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学术团体——一个独立的哲学集团。同年九月中旬在布拉格召开的德国物理学会和德国数学协会会议是一个外部诱因,促使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集团与柏林经验哲学学会——其成员有 Fr. 克劳斯(Fr. Kraus), 赖兴巴赫(H. Reichenbach), 赫尔茨贝格(A. Herzberg), 帕泽法尔(A. V. Parseval), 杜比斯拉夫(W. Dubislav), 格雷林(K. Grelling)——一起组织一个精确科学的认识论大会。与此同时出版了一本由卡尔纳普、汉恩和纽拉特写的纲领性的小册子:《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该书简短地叙述了该学派的历史、成员、倾向及目标。这本小册子是题献给石里克的,并于他在1929年10月返回维也纳时送给他,“作为对他回到维也纳所表示的感激和喜悦”——就像在该书序言中所特别写明的那样。这样,“维也纳学派”就为公众所知了。

这一新的阶段也表现为该学派确定了一份特定的机关刊物。1930年卡尔纳普与赖欣巴赫接管了《哲学年鉴》并以《认识》为名继续出版发行。该学派还找到了另一种出版手段:在1928年学派⁶中某些爱好普及工作的成员建立了“恩斯特·马赫”学会,^[4]该学

[4] 纽拉特在其著述中偶尔表现出一定的政治倾向性,丁勒(Dingler)在其《几何学基础》(*Grundlag der Geometrie* 1933)的序言中也责备维也纳学派的政治倾向。但这类政治倾向性与维也纳学派的目标完全无关。维也纳学派的目标是纯哲学性的。赖兴巴赫拒斥这类倾向性《认识》(第4卷,第75页以下),石里克教授在与我进行的交谈中也着重地对之加以否认。

会编辑了短篇专题文集《恩斯特·马赫学会出版物》；此外还有纽拉特在 1934 年编辑的《统一科学》丛书。

自此以后维也纳学派很快地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道。1930 年 9 月他们再次与柏林经验哲学学会一起，在柯尼斯堡与德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大会相联系组织了一个精神科学的认识论大会。大会的主题是数学与量子力学的基本问题。^{〔5〕}

卡尔纳普应邀去布拉格大学自然科学部担任副教授，这对维也纳学派说来的确是一个明显的损失。但此时卡尔纳普与物理学教授菲利普·弗兰克(Philip Frank)一起在布拉格形成了一个“维也纳学派”的分支。这两个团体与国外的志趣相投的思想家们进行接触，这些思想家中有人在哥本哈根的哲学教授耶尔根森(Joergensen)，有当时在贝桑松和开罗担任教授的鲁吉埃(Rougier)，有芝加哥大学教授莫里斯(Morris)，伦敦大学教授斯太宾(Stebbing)小姐，等等。和华沙的伦贝格的逻辑斯蒂学派也建立了个人交流。^{〔6〕}所有这些接触的结果产生了国际科学哲学大会。大会由鲁吉埃、赖欣巴赫、卡尔纳普、弗兰克和纽拉特于 1934 年在布拉格举行的预备会议所组织并于 1935 年 9 月在巴黎的索邦会堂召开。^{〔7〕}该次大会受到法国政府及在巴黎的国际科学研究所的赞

〔5〕 见《认识》第 2 卷，第 86 页以下对大会的报导。

〔6〕 这些流派的人物介绍载《认识》第 5 卷，第 199 页以下。

〔7〕 关于布拉格预备会议的报导见《科学的统一》，(*Einheit der Wissenschaft*) 1934 版，关于巴黎第一次大会的报导见《科学的哲学》(*Philosophie Scientifique*, Paris) 1935，及《国际科学哲学大会会议录》(“*Actes du Congrès internat. de philosophie scientifique*” *Actualité's scientifiques et industrielles* [(《科学与工业现状》) No. 378—395. Paris 1936]。《认识》第 5 卷，第 1 页以下及第 377 页以下，载有关于该两次会议的一篇报导。下列两书是作为该次大会的一种导引而出版的：沃勒曼《科学的逻辑和维也纳学派》(*La logique de la science et l'école de Vienne*, Paris, 1935)；纽拉特《维也纳学派的发展和逻辑经验主义的前景》(*Le développement du cercle de Vienna et l'avenir de l'empirisme logique*, Paris, 1935)

助,罗素和恩里克斯(Enriques)作了开幕词,有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约 170 位出席者。德国参加大会的除了柏林学会外只有明斯特大学的朔尔茨(Scholz)教授。这次大会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如果说在 1929 年的布拉格会议上维也纳学派的观点还是遭到激烈反对的话,现在这种观点已被广泛地接受了。恩里克斯和沃勒曼将军(Général Vouillemin)只是指出要当心独断主义和新经院主义,莫里斯反对片面性而赖兴巴赫则反对那种轻率地把某些东西说成是形而上学的倾向。有一些成员批评了某些具体的观点。在卡尔纳普的提议下成立了一个统一逻辑符号系统的国际委员会,首先将统一德语术语。大会还宣称将对纽拉特所建议的统一科学的国际百科全书予以积极的赞助和合作。〔8〕

紧接着在下一年,1936 年 7 月第二届国际性的“科学的统一”大会在哥本哈根举行。这次大会专门讨论因果性问题,并对量子物理学和生物学予以特别的注意。〔9〕参加者来自大部分欧洲国家,尤其是还有许多人来自美国,总共有近 100 人。N. 玻尔作开幕词。耶尔根森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发起本届及上届大会的推动力主要来自“维也纳学派”,而这一新的哲学运动的基本思想也必须归功于该学派。下一年,即 1937 年 7 月,第三届科学的统一大会再度在巴黎索邦会堂举行,其目的是讨论计划中的百科全书。〔10〕再过一年,在 1938 年 7 月,第四届科学的统一大会在剑桥举行。这次会讨论科学的语言。〔11〕G. E. 穆尔作开幕词,出席者仍是国

〔8〕 已于 1938 年及随后的年份内在芝加哥作为《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部分地出版。

〔9〕 有关报导载《认识》第 6 卷,第 275 页以下,并见《因果问题》(*Das Kausalproblem*, 莱比锡与哥本哈根 Leipzig and Kopenhagen, 1937)。

〔10〕 有关报导载《关于统一科学百科全书》(*Znr Enzyklopaedie der Einheitswissenschaft*, Haag, 1938.)。

〔11〕 有关报导载《认识》第 7 卷,第 153 页。

际性的。这些大会中的最后一届于 1939 年 9 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召开。之后,战争使这一切结束了。但这是一次辉煌的⁸兴起。维也纳学派已变为一场国际性的哲学运动,变为新实证主义或新经验主义。

与此同时,维也纳学派本身却承受了痛苦的损失。1931 年费格尔接受了衣阿华大学的教授职位,之后又被聘请到了明尼苏达大学。1934 年汉恩教授意外逝世。1936 年卡尔纳普在哈佛大学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之后去往美国并接受了芝加哥大学的职位。^[12]在这同一年,维也纳学派遭受了最为沉重的打击:石里克教授在大学内被一个精神错乱的原先的学生枪击致死。石里克就这样从他富有成果的工作中被永远地夺走了,他的进展就此被切断,大量未完成的计划就此被抛下。这是无可弥补的损失。现在,学派的集会中止了。1938 年德国强行吞并奥地利之后,学派的组织就完全解体,学派的成员分散到世界各地。魏斯曼和纽拉特去了英国。魏斯曼先在剑桥后又到牛津当了大学教授。纽拉特则于 1946 年死于英国。齐泽尔与考夫曼去了美国,齐泽尔于 1943 年在美逝世。门格尔与哥德尔先已应邀赴美。《认识》杂志于 1938 年从莱比锡迁往海牙,并在海牙给杂志第八卷取了《统一科学杂志(认识)》的刊名。但由于战争,杂志于 1940 年只能停止出版。维也纳学派的出版物被禁止出售,因为在学派的成员中有一些犹太⁹人,而且“恩斯特·马赫”学会的活动被认为是“颠覆性的”。

在维也纳再也没有维也纳学派了。但是学派的观点却在国外流传并日益普及。尤其是在美国,那儿已存在着一个以莫里斯、兰福德(Langford)、刘易斯(Lewis)、布里奇曼(Bridgman)、内格尔

[12] 因此,卡尔纳普并不是像勒曼(G. Lehmann)在《当代德国哲学》(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1943, p. 293)一书中说的那样是“移民去美国”。

(Nagel)为代表的并行的运动。^[13] 在美国,赖兴巴赫和米泽斯(R. V. Mises)找到了安身之所,而且眼下卡尔纳普在芝加哥、费格尔在明尼苏达、贝格曼(Bergmann)在衣阿华、亨佩尔(Hempel)在耶鲁大学继续着维也纳学派的工作。在英国——作为整个运动的始祖的罗素所居住的国家——维也纳学派通过魏斯曼而在牛津、通过艾耶尔(以及在基本之点上通过波普)而在伦敦大学长久地流传。伦敦大学的斯太宾小姐(1943年逝世)也代表着类似的观点。^[14] 的确,波普博士从未参加过维也纳学派的集会,但他与学派的某些成员(卡尔纳普、费格尔、克拉夫特)保持着个人之间学术上的接触。在芬兰,维也纳的工作引人注目地被继续了下去。这是通过凯拉及 G. H. 冯赖特的工作。凯拉像艾耶尔那样曾有一段时间亲自参加过维也纳学派的晚间集会,而冯赖特则是凯拉在赫尔辛基大学的同事和原先的学生,他现在剑桥的教授。林德曼(H. A. Lindemann)博士也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他回到了过去曾居留过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目前在那里从事写作。也是维也纳学派成员的洪谦博士先是在中国武昌的武汉大学,现在则是北京大学的教授。

¹⁰ 很自然,维也纳学派的前成员们并不就停留在他们过去的立足点上,他们进一步向前发展并部分地废弃了他们原来的观点。

接近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还有哥本哈根的耶尔根森教授,苏黎世的迪尔(Dürr)教授,法国的鲁吉埃教授、沃勒曼将军、M. 博尔(M. Boll)以及其他一些人。另外还有一些地方也与维也纳学派建立了联系,在这些地方至少有部分相类似的思想居于支配地位,如[瑞典]乌普萨拉的经验主义学派和隆德的特根(Tegen)教授,^[15] 哥丁根、明斯特、华沙和伦贝格的逻辑斯蒂学派。^[16] 但华沙和伦

[13] 其文献见于期刊《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 Baltimore)1930年以后;又见于《符号逻辑杂志》(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 Baltimore),1936年及以后。

[14] 其文献见于期刊《分析》(Analysis, Oxford)1933年及以后。

[15] 发表于期刊《理论》(Theoria Llund)1935及以后。

[16] 以《哲学研究》(Studia Philosophica Lemberg, 1934—1938)为其机关刊物。

贝格的学派也像维也纳学派一样被战争拆散了。

只是在德国,维也纳学派的思想没有得到传播。对这些思想,罗素(举例来说)在批判之中搀杂着真诚的赞叹;^[17]即使是更为挑剔的人也没有否认它们的意义。^[18]可是在德国,如果说它们尚未被完全漠视,那也已被坚决而轻蔑地拒斥了。^[19]石里克在他的

[17] 罗素:“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1946,载《论争》(Polemic)第1卷。该书第7页把维也纳学派——“该学派为哲学家之间富有成果的合作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实例”——与华沙学派一起称为“具有最高能量”的学派。“维也纳学派因其用科学的方式来研究哲学的决心,因其对真理的决不退缩的热爱,因其在逻辑学、符号关系学及语义学方面的专门研究而值得人们的仰慕。”“但是,尽管这一学派极其优秀,它也还有着一定的狭隘性,对于某些相当重要的问题却是视而不见”,诸如心理学问题和另外一些问题(第12页)。

[18] 因之,温伯格在《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考察》(An Examination of Logical Positivism 1936)一书中在若干批判之后加上了下面这样一段赞语:“尽管如此,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进行的那些对逻辑、数学及对科学体系之性质的研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看来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些方面的研究至今为止已经取得了对于逻辑和科学体系的最为清晰的洞察。而正是这一点应当被看作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最有启发性的贡献”(第294页)。佩策尔在《逻辑实证主义》(Der logische Positivismus, 1931, Goeteborgs Hoegskolas Arsskrift, 37)一书第36页上说:“尽管在这里表示了这些有所保留的意见,我们还是相信,像主张科学世界观的维也纳学派所努力从事的那种对科学语言的修正将具有极高的价值。”

[19] 海姆塞特(Heimsoeth)就是采取了这种态度。在他所编的文德尔班(Windelband)《哲学史教程》(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1935, 第574页)中,他说:“[维也纳学派]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教条出发来看人、精神和历史、而据说这种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教条并不预设任何本体论的教条。这样,他们就在一切根本之点上最终误解了人,误解了精神,误解了历史。”德尔·内格罗在《当代德国哲学》(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1942, p. 8)一书中也说:“新实证主义不仅对形而上学而且还对一般的哲学努力猛烈地宣战。”这一主义“通过把它的主张披上逻辑的外衣,力图使之显得具有一种空前的确切性。和马赫相比,其唯一的新奇之处仅仅在于形式主义方面。”格哈特·勒曼在《当代德国哲学》(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1943),博申斯基在《当代欧洲哲学》(Europäisch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1948, p. 62f.)中也都采取了这种态度。勒曼在书中仅仅提到了卡尔纳普(见本书第102页引文——指边页码,下同)。不采取这种否定态度的唯一例外是阿斯特(E. V. Aster)的《当代哲学》(Di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1935, 第177页以下)一书。

论文《维也纳学派与传统哲学》^[20]中这样写到那些对维也纳学派的责备：“维也纳学派经常受到责难说，它不是由哲学家而是由哲学的敌人所组成，它的教导对哲学的发展与进步毫无贡献，相反却要造成哲学的解体。”可是只有把哲学与形而上学等量齐观的人才会这样说话。但可以肯定，排斥形而上学并不是由维也纳学派创始的。^[21]在同一篇论文中石里克对历史上的哲学所说的那段深有领会的话，证明了责备他们轻蔑哲学是没有道理的。石里克说^[22]：“反形而上学的人往往对传统哲学不够公正，他们宣称传统哲学只是一堆伪问题而已。我认为，事情恰好相反。我们的思想是人类智力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很有理由为此而感到骄傲。”“我们应当对过去的哲学体系有历史的理解，它们的教条不再使我们激怒；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来赞美人类的那些伟大光辉的时代——正是这个人类，无论是在它的探索中还是在它所犯的错误中，同样都表现出对真理的深沉追求。”人们不应当仅仅根据维也纳学派中某些激进成员所说的话来评判该学派对传统哲学的态度。的确，对一个具有下面这种看法的人——即把哲学看作是一种关于生活和世界的个人智慧的表述、一种对生活对世界的主观解释，或者把哲学看作是寻求用思辨方法来构造的一种对世界的说明（离开了哲学，这种说明就是隐蔽而不可知的），或者把哲学看作是寻求一种概念性的世界之诗篇——对一个持有这种看法的人来说，的确，他不能不把维也纳学派所阐释的哲学看作是哲学的贫困。因为这种哲学排除了一切不能由科学方法获得的东西。但是，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超出哲学的主观分歧

[20] 《论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1938, 第 390 页。

[21] 上引书, 第 391 页。

[22] 上引书, 第 394 页。

维也纳学派的工作

维也纳学派的组成情况使我们不能指望该学派会像那种简单地接受同一位老师思想的一群学生那样有着统一的观点。不管怎么说,至少该学派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独立的思想家。其激进的一翼以纽拉特为首,其中有汉恩,还经常有卡尔纳普参加。这一翼,正是由于他们的激进主义,其影响往往起着激励性的有时也是迷惑性的作用。该学派还有一个较为温和的派别,石里克即属于这一派。在细节上的不同之点很多,其中有些在石里克的论文《维也纳学派……》^{〔1〕}中已经述及。对维特根斯坦的论点,有着各种不同的态度,对于概率理论也没有一致的看法。但是,在根本之点上大家的看法则是相同的。

有一个共同的信条是:哲学应当科学化。对科学思维的那种严格要求被用来作为哲学的先决条件。毫不含糊的明晰、逻辑上的严密和无可反驳的论证对于哲学就像对于其他科学一样都是不可缺少的。那种仍然充斥于今日之哲学中的独断的断言和无从检验的思辨,在哲学中是没有地位的。这些先决条件隐含着对一切独断—思辨形而上学的反对。应当完全取消形而上学。维也纳学派就这样和实证主义联在一起了。

〔1〕 例如,石里克在其论文《维也纳学派与传统哲学》(“L'école de Vienne et La Philosophie traditionnelle”1937,载《论文集》第391,392,395页)中对纽拉特在哲学方面的激进主义的批驳以及纽拉特在《彻底物理主义与‘真实世界’》(“Radikaler Physikalismus und Wirkliche Welt”,载《认识》第4卷,1934,第346页以下)一文中对石里克的“确感”(Konstatierung)的批驳。

然而,在这一总的倾向性之外或之上,还存在着基本观点上的¹⁶意义深远的一致。从外表看来这就是经验主义,就像罗素所代表的那种经验主义,它要求对先天主义的否定。不可能有那种康德意义上的先天综合判断。关于实在的陈述只有依据经验才能成为有效。在那时的十余年前由怀特海和罗素所发展起来的新逻辑进一步给出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从罗素和怀特海的工作出发写出了《逻辑哲学论》(1922)^[2]。维特根斯坦在该书中发展起来的语言哲学又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正是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的批判性考察——这种考察部分导致了这些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部分导致了对这些思想的改造或放弃——维也纳学派的工作大大地开展起来了。

相应地,注意力被主要放在逻辑的、认识论的及语义的问题上面。同样,科学的世界图像也是被研究的问题。由于有着如此广泛的一致性,因此就不需要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讨论如何建立共同的基础上面,而各种特定的问题也就可以直截了当地着手处理。这就是维也纳学派的合作之所以能取得这么不平常的丰富成果的原因。

[2] 初版题名“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载于《自然哲学年鉴》(Annalen der Naturphilosophie)1921。